

明清时期黄河下游决泛区的时空变化及其人地关系规律

吴俊范

摘要: 明清黄河下游决泛水沙对颍河沿岸平原地区的环境和地表塑造的影响相对较轻, 颍河两岸未形成显性决口扇地貌, 历次黄泛水沙一般未越过颍河向西南漫溢, 颍河干流长期作为黄泛水沙的良好容受体及其向西南蔓延扩张的界隔线。涡河沿岸地区受到明清黄河独流干道决口水沙向南泛滥及涡河本身被黄水夺溜时决泛水沙的双重影响, 黄河主故道南岸核心决口扇的边缘带与沿涡次级决口扇相互交集, 在涡河地区形成叠加型决口扇地貌, 涡河干流长期作为黄泛重灾区与影响轻微地区的分界线。大型湖泊洼地的积水面通常与黄泛决口扇的前缘互为进退, 鱼台县的土壤分布及农作物结构特征, 较好地证明了南四湖洼地长期作为黄泛决口扇的边界, 南四湖是明清时期黄泛水沙向北蔓延扩张的重要蓄洪区和调剂区。

关键词: 明清黄泛区; 显性边界; 决口扇; 土壤; 水患记忆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12-0121-10

明清黄泛区的生态环境史向为学术研究之热点, 学者往往注意对主干道决口地点及决泛频次的统计, 以期掌握黄河下游河道的水文规律^①; 或者是对黄河下游苏鲁豫皖接壤平原地区的水系、植被、社会、民生等自然及人文要素, 在长期黄河水患影响下所发生的生态环境变化进行复原, 以凝炼这一特殊地区的人地关系特征^②。前人研究均无可避免地涉及对明清黄河下游决泛区时空范围的界定问题, 而厘清这一时期黄河水沙影响的地域空间, 将其落实到具体地点和地理位置上, 可以说是对黄泛区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叠层式”变迁过程开展精细化研究的前提之一。苏鲁豫皖接壤的平原带在历史上经常遭受黄泛冲击, 不同时间的黄泛都在平原上留下水冲地貌和泥沙堆积层, 我们今天所见沿黄河故道两侧的冲积平原地表, 实际是历次黄泛泥沙层堆叠累积的结果。而明清黄河下游独流夺淮入海期间所形成的黄泛泥沙层, 由于清后期黄河北徙后未再受到大规模的黄泛影响, 其在人类开发下逐渐演化为

今天的耕作土壤层和人居聚落的地基, 这使得明清黄泛区环境空间的界定对于今天该区的农业发展规划及人居环境优化等现实问题, 具有直接的参考意义。从学术意义上来说, 厘清明清黄河下游决泛水沙所塑造的地理空间, 更助于剥离和分析明代以来黄河下游平原地区的环境变迁机制和人类活动进程, 并与明代以前的黄泛影响区研究进行更好对接。

对于明清黄泛区的空间范围, 目前主要存在两种理解: 一是通过统计决溢地点和次数来表示受黄泛水灾的区域和程度。但决溢地点的叠加并不直接等于黄泛区的范围, 决口发生在黄河主干道或主要的夺溜泛道上, 决口后洪水及泥沙所淹没的地区受水流方向、地形地貌、人工堤防等因素的影响, 受水沙灾害的程度也不尽相同, 因此以黄河下游河道决溢地点的总和来表示黄泛区的范围, 存在较大局限性^③。二是从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等特征一致性的视角, 对明清黄泛区范围进行大致认定。例如, 刘会远主编的《黄河明清故道考察研究》一书, 将今“豫、

收稿日期: 2024-09-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7—20世纪长江三角洲海岸带环境变迁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20&ZD231)。

作者简介: 吴俊范, 女,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34)。

鲁、苏、皖四省相对贫穷落后的地区”作为明清黄泛区的主体,并认为其落后根源与黄泛影响下的水土环境退化有关^[1]。胡其伟《明清时期黄运交汇下苏鲁豫皖接壤地带的耕作制度变迁》一文所界定的黄泛区,是指黄河长期夺淮致使其地理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地区,其主体是“苏、鲁、豫、皖接壤地带,包括今江苏徐州、连云港,山东济宁、临沂、菏泽,安徽淮北、亳州、阜阳、宿州,河南商丘、周口、开封、濮阳等地市”,黄泛影响的后果则表现为“耕作制度甚至民风民俗恶化”“经济始终薄弱”^[2]等。还有一种观点是从局部区域研究的需要出发,将沿废黄河故道两侧的带状决口扇地区默认为黄泛区,例如《江苏农业地理》一书,将江苏省域内的黄泛区界定为“沿废黄故道两侧,西起丰、沛,中经宿迁、泗阳,东到涟水、滨海的大弧形平原”,指出这一地区的地表组成物质以近古河床沙土为主,向两侧逐渐变细为淤土、两合土^[3]等。总之,目前对明清黄泛区时空概念的认识仍然失之笼统,并未见从科学指标或显性地理景观参照等角度对明清黄泛区范围进行较为具体准确的界定,而这又是黄泛区生态环境史、社会史等研究所应依据的基本地理框架问题。

本文尝试以明清黄泛决口扇的位置分布及土层规律为切入点,通过对扇缘带黄泛泥沙沉积层次的分析,来厘定明清黄泛区若干显性边界的位置及其环境特征,并将边界位置与较有影响力的地理景观相对应,以便于相关学术研究的参考和采纳。由于行河时间较长,沿明清黄河下游主河道地区及主要泛道两侧广泛发育有显性的决口扇地貌,而决口扇群的分布范围基本等同于该时期黄泛水沙漫流及沉积的核心地带。一般来说,从扇顶到扇缘地面逐渐降低,堆积物颗粒由粗变细,堆积高度由厚变薄,根据这些规律并结合历史文献对黄河水患的记载,可对决口扇边缘的界限和环境特征进行大致识别。

作为线状的地理边界,需用大量细密的基层地名来勾勒(如村、镇聚落地名),但古代方志对与河患影响相关的乡村地名的记载较少,出现较多的是州县等高级地名,为弥补这一缺失,本研究纳入沿黄河故道各市县的现代地名志资料,其中详细的乡村聚落史沿革资料和乡镇土壤资料可为本研究所用。地名志所载的聚落历史地理沿革资料,一般是通过实地调查、口述采访、查阅宗族家谱、参考现代器测数据等渠道综合获得,聚落单位又能具体到最基层的自然村落,为我们细密化地开展黄泛区环境史的研究提供了良好资料。

一、颍水沿岸:非显性决口扇与轻灾区的边界

1. 颍水:明清黄泛区的西南边界

古代颍水是淮河最大支流,源出古颍川郡阳城县西北之少室山(今河南省登封市境),东南流,合汝水、沙水、汾水,经西华、商水、周家口、项城、沈丘等淮北重镇,至正阳关入淮(今安徽省寿县境)。颍河水势旺盛,水量丰富,是元明时期中原沟通江淮的主要漕运航道。元中后期黄河开始经常南下侵颍,颍水成为黄河下游行洪分流的主要河道,河身渐受淤塞,但基于颍水在区域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政府倾注巨力对其河道进行维护和治理。以明洪武七年(1374年)疏浚治理颍水为例,当时因“河决开封,堤河壅塞,漕运不通,参政安然亲督工疏导之”;工成之后,知州李子仪又“率民筑堤,以备其后,河虽间溢,竟不为灾”。^[4]从这次高规格的治河活动,可见黄河夺颍虽带来颍水河道淤高、易决易泛等问题,但通过及时疏挖泥沙、加固堤防等治河措施,尚可正常维持其漕运通航及泄洪功能。

黄河夺颍、夺涡事件在元明清时期多有发生,故此先将涡水与颍水所受黄泛之影响共同讨论。涡河为淮河第二大支流,在颍河东北面,流路与颍河平行,均为西北偏东南流向,但水量及行洪能力比颍河为弱(今涡河流域面积1.59万平方公里,行洪能力2480立方米/秒;颍河流域面积3.67万平方公里,行洪能力3000立方米/秒)。治黄淮水利史者对颍、涡二河的水文史及水患史均十分重视,主要是因二河位置相近,贯穿整个淮北平原,又都曾为宋代以后黄河洪水夺溜入淮的重要通道。

韩昭庆全面梳理了元代中期以后黄河夺颍、夺涡各次事件,统计结果为:元代夺颍7次,夺涡8次;明代夺颍5次,夺涡4次;清代夺颍5次,夺涡7次^{[5]49-67}。从中不难看到,各时代颍、涡承受黄水夺溜的频次不相上下,但相较于历代黄河下游决溢夺溜次数之多以及独流汇淮时期决堤泛滥的高频率来说,其入颍、入涡的次数均不为多^④。前人对黄河下游河道流路选择的偏好性已有所分析,认为黄河夺颍、夺涡次数较少的原因,一是早期淮北平原的地势倾斜度使然,二是黄河水流就下选取最短流路入海的特性使然^⑤。

黄河下游南摆多觅汴水故道为主干,即便明中期堤防约束下形成的单一河道,也仍然部分行走汴

水故道,概因汴水具有较强的行洪能力,且由此入淮通海的路程较短、坡度最陡^⑥。汴水河床长期接受黄河泥沙的淤积,自然会有所抬高,但在溯源冲刷作用下,河床下切度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故汴水具备长时间担任黄河行洪河槽的条件。然而在洪流过大,汴水河床垫高程度较为严重时,黄河洪水则绕过汴水,向南寻觅分流通道的,这时颍、涡二河作为入淮主要支流,担当起分流黄水的角色,故有观点认为,颍河、涡河实际上是从汴水泛道岔分出去的流路^[6]。但毕竟黄河泛水经由颍、涡入海流路较长而曲折,行水动力减弱,而颍水又位于淮北平原地势较高的西南边缘(淮北平原地貌被明清黄泛泥沙显著垫高之前,其地势略由西南向东北倾斜,西南部较高),经颍的泛流自然有着向东北较低处摆动的趋势,因此颍水实际上成为明清黄河泛道行水的西南边界。

韩昭庆认为,黄河历次夺颍、夺涡,并未造成颍、涡主干的改道变迁,主要是造成上游一些二级支流被黄河泥沙所湮没,以及主干河道的局部泥沙淤积^[5]⁶⁹。而且至今颍、涡二河的行水动力与行洪能力依然较强,这说明明清时期黄泛泥沙对二河河床本体的改变是有限的,根本达不到像淤塞填平其东北面的汴河与睢水河道那样的程度。究其原因,与颍、涡河床本身处于沉降断裂线的地理位置(河床下切度及行水量较好)、淮北平原的地势倾斜、黄泛夺溜后入海流路较远等因素均有关系。

颍水作为明清黄河下游诸泛道之一及泛滥洪水行走的西南边界,亦可由现代地质地貌测量数据得到验证。查阅1989年版《中国黄淮海平原地貌图》可以发现,周口以下的颍河中下游河道沿线,存在一条连绵不断的细长形故河道微高地(属古颍河河床及其河漫滩淤高的遗迹),而河道两侧却没有形成显性的决口扇地貌;但是在明中期以后大堤约束下的黄河独流故道两侧,却连绵存在泥沙高厚、相互堆叠的舌状决口扇群^[7]。这一对比性的地貌现象说明,有堤防约束的单一型黄河主河道,其决口输出泥沙的数量及扩散距离、力度等,远远大于作为分流泛道的颍水决泛。颍水即使在黄河夺溜期间发生决口,其溢出的泥沙数量及其在两岸的堆积能力都是有限的,并不足以形成显性的决口扇。由此也可推知历次颍水所分流的黄泛水沙比例并不是很大,大量洪水及泥沙或是通过淮北平原上其他众多的西北—东南向河流进行分流和排泄。

另一不可忽略的事实是,颍水中下游北岸也是

1938年花园口决堤后黄泛水流的主要行洪区,这次长达9年的泥沙堆积与明清时期的黄泛泥沙相叠加,也仍未在颍水两岸塑造出显性决口扇,这除了因为西华—周口—项城—阜阳等沿颍地区距离花园口决口中心位置较远,水沙流力到此已分散减弱,同时也证明历史上颍水中下游沿岸地区受黄河泛滥的影响本身就较小,属于黄泛泥沙堆积薄弱的地带。由此也可洞察到,经过明清时期黄河主河道决泛泥沙的强劲堆积,沿黄决口扇群形成连续的高地,已使淮北平原的地势发生显著改变,原本较高的颍河北岸地区反而成为沿黄决口扇群边缘以外的相对低地,民国花园口决堤后的黄泛水流向该区行水是一种自然的选择。

2. 非显性决口扇特征

由于时间并不太久远,明清时期黄河夺颖的水沙宣泄对区域地貌及生态带来的影响,必然在颍河沿岸不同地区的表层土壤状况上有所表现,黄泛水灾事件也会不同程度地保留在民众记忆深处,为此我们选取沿颖的今周口市川汇区作为案例区域。川汇区位于颍河中游平原,跨颍河两岸,居沙河、颍河、贾鲁河交汇之处,历史上为黄泛夺颖必经地区,曾经受到黄泛水沙的较大影响。该区开发历史悠久,明初洪武、永乐间,颍河南北两岸已形成集市——永宁集和周家口,其中周家口后来发展为著名的水陆交通要冲及区域中心城市^[8]¹。

通过查阅川汇区182个自然村的沿革史及社会经济情况(截至2004年存在的村庄),发现只有极少数村庄较为清晰地保持着对明清黄泛灾害的记忆,而这些村庄的水土环境也具有黄泛遗存特征。此类村庄全部位于颍河北岸的北郊乡境内。最典型的两个村庄是李多楼村(又衍生出“后李多楼村”)及箔箩张村。两村历史地理沿革情况如下:

后李多楼村:位于乡政府驻地东北两华里,市园艺场东侧。村民原与李多楼同村,因地处黄河故道,风沙大,1962年近五十户村民北徙此地建村,因在李多楼之后,故名。

主产小麦、大豆、瓜果、花生。^[8]⁵¹⁻⁵²

箔箩张村:位于乡政府东4.7公里处,周淮公路北侧。张姓村民自称是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人,清初移民至此。因先辈常受黄河泛滥之苦,生活无着,无奈在荒滩上以编箔箩为生,并定居下来,渐成村落,人称箔箩张。

主产小麦、玉米、大豆。^[8]⁶²⁻⁶³

颍河南岸的村庄史却与北岸有着显著差异。在

颍河南岸的南郊乡及蔬菜乡,有上百个村落,其沿革史叙述无一显示出与黄泛灾害有关的历史记忆,即便有一些村庄的初始地貌被表述为水灾影响下的河堤、河滩、坡地等,但所指也应该是与沙河、颍河本身演变相关的地貌,与黄河夺溜泛滥的遗存(包括明清多次黄泛与民国花园口决堤黄泛两个时期的影响)似乎没什么关系。此以南郊乡黄滩村及官坡村的沿革史为例:

黄滩村:位于乡政府驻地东3公里,西、北、东三面为颍河堤环抱,为村委会驻地。明朝中期,黄姓在河滩下建村定居,故名。明末黄姓衰落,李姓渐为大户,仍沿用原村名。^{[8]37}

官坡村:位于乡政府西5公里处,沙河东岸,周漯公路北侧。清朝中后期,沙河沿岸外堤低矮,汛期河水经常漫溢、决口,坡地附近杂草丛生,官府常在此放牧骡马,又因地不保收,不向官府完粮纳税,故名官坡。^{[8]44}

地名志最注重聚落沿革史的编制,其依据的资料多源而丰富,除了参考官方统计发布的自然地理及经济、人口、土地、土壤、作物等数据,还大量纳入实地调查、群众采访、家谱搜集等途径获得的调研资料,所以一本好的地名志,就是一部充满精彩细节的地方性人类活动史,也可说是一部充满基础素材的地方环境史的底本。根据上述川汇区受历史黄泛水灾影响的村庄数量很少,且颍河南岸村庄的水灾基本与黄泛无关的情况,可初步判断明清时期的黄河南泛对颍河两岸地区的生态影响是相对较轻的。这与前文所揭颍河居于明清黄泛区西南边界的判断得以相互印证。

但前述引文中言及川汇区北郊乡一带“先辈常受黄河泛滥之苦”,可知该区地理环境仍然受到历史黄泛的影响,那么其受黄泛灾害的程度和范围究竟如何呢?清康熙《陈州志》卷首“陈州四县总图”提供了直接的线索,可借以观察颍水北岸的黄河泛滥情况^{[9]四县总图}。图中有一条“故黄河”(无确切名称)由西北往东南延伸,在周家口东面加入颍水,其部分河段正处于今周口市川汇区境内。由此推测,在颍河北面平原上可能还存在若干黄泛分流的河道,但史料并不一定显示其确切名称,“故黄河”实际是对黄泛夺溜故道的一种模糊性表示。由于黄泛水沙至此力弱,无堤防约束情况下分流河道也较多,泥沙堆积对该区地貌的塑造可能主要表现在泛道的河漫滩范围及近侧,蔓延的距离并不大。如上述引文中的“李多楼村”,原处黄河故道,风沙大,但

迁移到新地址(后李多楼村)就拥有了较好的生态。

通观清康熙《陈州志》所载该区历史上发生的水患事件,多是与自然降水引发的汛期洪水及平原低洼区的排涝不畅有关,把原因归结到黄河泛滥的较少。地方上的水利治理,也多以疏通沟渠引排积水为主旨。清康熙《陈州志》“河渠”一节,对明代政府主导疏浚沟洫事件记载甚详,例如“明万历二十一年,又大水,二十三年知州杨堪申准筑堤堰、通沟渠,二十四年复大浚沟渠,建创桥闸”^{[9]20}。关于历年大肆疏浚河渠的原因,其表述为“陈地污下,河渠最多,但淤塞既久,每值雨水连绵,田禾淹没,历年受害”^{[9]21},并不提黄泛泥沙淤积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筑堤和疏浚作为常态化的平原河道治理措施,在明代陈州地区一直是奏效的。

综合分析,在堤防不完备的条件下,黄河洪水进入地势较高的淮西北平原后通常是多支分流,流路曲折而水动力较弱,故明清黄泛对颍河两岸平原地区的环境影响相对较轻,受灾主要表现为分流泛道的河床淤高及河漫滩的拓宽,或轻微向河道两侧的泥沙漫溢,颍河两岸地区并未形成显性决口扇地貌。在颍河北岸虽有部分区域直接受到黄泛水灾的冲击(从一些村庄的黄患记忆可见),但沿颍两岸土壤的总体状况在文献中被表述为“土质肥沃”^{[8]24}、“土质肥沃”^{[8]46},可见明清黄泛水沙对颍河沿线地表塑造的影响确实相对轻微。

实际上颍河沿线也是民国花园口决堤后黄泛影响的重要区域,这除了印证明清黄泛泥沙对沿颍区域的填淤并不充分,地表高程差仍有利于洪流向下行水,也说明水量丰富的大江大河具有强大的行洪行沙容量,因而使得历次黄泛水沙一般不过颍河向西南漫溢。从某种程度上说,长期以来颍河沿岸地区发挥了良好的黄泛滞洪区作用,水量丰富的颍河干流成为黄泛水沙蔓延扩张的容受体和界隔线。大河干流充当明清黄泛区边界的现象,在稍往东南的淮河中游干流段也有明显体现,我们查阅史料发现,淮河中游河道也长期担任着黄泛水沙蔓延的界隔线。清乾隆八年(1743年)颍州太守在实地考察中看到,淮河两岸的水系、土壤、农业植被等景观存在截然差异:“霍邱一邑,隶淮南,其南乡大半皆营水田,植秔稻,渠塘堰坝蓄泄以时。阜、颍、亳、蒙、太五属,隶淮北,俱系旱地,树艺菽麦等,一望平衍,阡陌虽具,沟洫早淤,无怪泛滥之水入而不能复出也。”^[10]这说明淮河中游干流在黄泛区生态版图中具有重要的界限作用,明清黄泛决口扇的环境影响

并未达到淮河中游的南岸。

二、涡水沿岸：叠加型决口扇与重灾区的边界

1. 涡水沿岸：双重水灾影响

涡水横贯淮北平原中部,在颍水之东北,就黄泛水流选择最短最陡流路入海的偏向性而言,涡水更易受到黄水夺溜或成为分流泛道。韩昭庆在对元明清时期夺颖、夺涡事件进行比较后指出,黄河自发夺涡的可能性大于夺颖,但涡河行洪能力较小,其在长时间承受黄河巨量水沙压力的情况下,自身易于发生决泛^{[5]62}。这就使得涡河沿岸地区受黄泛水灾的情况更为复杂,不仅受到黄河独流干道决口水沙向南泛滥的影响(涡河比颍河更接近明清黄河下游主故道),涡河本身被黄水夺溜时的决口泛滥,亦对其两岸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较大影响。

查阅古代沿涡州县的地方志(如柘城、亳县、蒙城),其中多见由黄河干道决口带来的水患事件,对于涡河本身的决口情况却少见记载^⑦。明清黄河下游独流夺淮时期,政府治河重点在黄河主干道的行河路线及堤防建设,涡河作为一条分流泛道,其水文变化及致灾情况不被官志所重视是可以理解的。但换个角度来看,仍可发现少许与涡河自身水文相关的史料。例如嘉靖《柘城县志》“灾祥”条记嘉靖十七年(1538年)，“河决境内，淹没禾稼，民逃外境”；嘉靖二十二年七月，“河决境内，风雨大作，堤决，水浸城内，将县治学舍公馆尽行淹没”^[11]。前人已指出明嘉靖年间长期发生黄水分流入涡及主流夺涡事件^{[5]60-61}，因此前引史料可以理解为柘城县境内的涡河河身在承受黄河洪水袭夺下所发生的决口泛滥，县志亦是以本地灾情的形式予以记载。

涡河沿岸既接近黄河主干道,其经常为黄河干流决口所殃及是毋庸置疑的,但在黄水夺涡时,由涡河自身决口向两岸的直冲式泛滥也对该区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影响,因此,沿涡地区是承受双重水灾的区域。关于此点,我们还可根据今涡河沿岸聚落的水灾史记忆作进一步分析。本文依据《河南省柘城县地名志》,对今柘城县境内贴近涡河南北两岸的铁关、安平、李原、皇集、邵园、张桥、陈青集等乡的村庄沿革史资料进行了统计,发现一些村庄保存着清晰的关于河水淹村的历史记忆,民众记忆中的水患发生时间,大部分可追溯到明清时期,甚至远溯到北宋^⑧。村庄记忆中古代水患的发生源头究系黄河还

是涡河并不明确,多是笼统表述为“水溢村”(如梁庄乡玉皇庙村)、“水患”(如安平乡后张店村)等,但对于水灾造成损失的表述都偏向严重性,如“禾稼淹没”(如皇集乡阎庄村)、“粮食绝收”(如铁关乡义醒岗村)等,亦有言及村民为避水灾而经常外出逃难,可见这一带受洪灾影响的程度是较为严重的。

2. 显性决口扇特征

沿涡地区所受历史黄泛水灾的生态效应,不仅反映在两岸聚落的水灾史记忆中,更可通过观察该区地表的土壤类型和相应的农作物分布特征得出。这种分析基于黄泛决口扇形成过程中的泥沙沉积规律。受黄泛决口影响严重的主干河道两岸地区,普遍存在由黄流所挟泥沙反复堆积而形成的冲积扇,扇顶在黄河水道决口的地点,扇缘即是漫流洪水所到达的边界。黄泛泥沙随水流急缓和地形高洼变化而沿程沉积,形成不同类型的沉积物区块,经过人类活动的加工和农业生产活动的改造,成为今天所见沿黄冲积扇的表层土壤带。一般而言,决口扇地区的表层土壤,由决口地点向扇缘边界依次呈现为沙土、两合土、淤土、盐碱土等。沙土一般分布在近河岸地带,在水流速度较急情况下粗粒沉积而成;淤土多分布在距河岸较远地带或低洼区,在水流放缓情况下细粒沉积而成;两合土则是介于沙淤之间状态的混合类型。因此可以说,沙、淤、两合这三种土壤的组合结构,代表了黄泛决口扇的一般性土壤特征,尽管受原地貌高洼不均之影响,三种土壤组合的内在结构复杂多样,但并不影响其作为判断黄泛区范围尤其是黄泛决口扇范围的重要指标^⑨。

黄泛决口扇最显著的分布区,是在明清黄河下游主故道的南北两岸,主要区块有南岸的开封平原、兰考平原、商丘平原、徐淮平原,北岸的单丰平原(单县、丰县)、泗淮平原(泗阳、淮阴)^⑩。这些区块表层泥沙堆积高厚,高程偏高,规模较大,略有坡度,相互连接成群,形成明清黄河主道频繁决口影响下最显著的地表土层遗存,本文将之称为核心决口扇地区。

观察柘城县境内涡河两岸的土壤特征,该区虽处在明清黄河下游主故道南侧核心决口扇的边缘地带(黄河主干道决口对此区的影响前文已论),但其表层土壤却表现出黄泛沉积物带状分布的强规律性。在涡河南岸的安平乡,其土质多为沙土和淤土,铁关乡主要为淤土;在涡河北岸的皇集乡,土质为淤土及两合土,李原乡亦为淤土和两合土^{[12]260-294},这种沙土、淤土、两合土组合式土壤发育,以涡河河

道为中轴线向两侧呈对称性分布。这种大区片式的沙淤土壤,是以大量流水作用下的泥沙沉积为基础,比较肯定的是由黄泛水流所供给。由此我们初步认为,在黄河夺涡情况下,涡河本身发生的决口在其两岸地区也形成了规律性分布的决口扇地貌,它与黄河主道决口所形成的核心决口扇边缘带相互叠加。

再举一个村庄的例子:柘城县铁关乡的沙王庄村,紧靠涡河南岸,在明万历年间即有王氏迁居至此形成聚落,并且因“土质多沙”而得名“沙王庄”^{[12]301},这说明涡河沿岸的沙土带形成较早,并非只是习惯上认为的1938年花园口决口黄泛带来的物质,花园口这次只是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黄泛夺涡事件之一,其带来的泥沙只是加积在明清黄泛土层的基础之上。

为进一步认识涡河沿岸土壤分布的规律性,以下再对安徽省亳县(1986年亳县改称亳州市)所辖各区的土壤及农作物情况进行统计。涡河为亳县最大的干河,由东北向西南贯穿全境,一直以来涡河水文对该县地理环境都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1984年编成的《安徽省亳县地名录》收录有各乡镇的地形、土壤及农业资料,本文主要选择亳县境内紧贴涡河河道的区片(包括南临涡河、北临涡河、东临涡河、跨涡河等不同位置的乡镇区片)进行统计^①。统计发现,亳县境内涡河两岸的地势和土壤分布显著表现出河流决口扇的特征。河床及滨河地势先被决口泥沙淤积所抬高(刘小庙、十八里、大杨三区片为典型,地势均由河岸向外侧呈坡度倾斜),后洪水挟泥沙由河道向远处漫溢,沉积物结构随水流和地形发生变化。涡河沿岸各区片普遍具有沙土、淤土、两合土组合型土壤带,靠近河岸的各乡均有大面积的沙土堆积,远离河岸的地带分布着淤土和两合土。总体上,各乡镇基于地处涡河南北岸的差异,以涡河主道为轴线,其土壤格局表现为“北沙南淤”或“南沙北淤”。由于涡河两岸沙土堆积较厚,地表增高,原有的沟洫系统受到扰乱,因此形成了以旱作为主的农业风貌,没有适合种植水稻的灌溉水系,农作物主要是小麦、玉米、大豆、红芋、高粱等,这同黄河主故道两侧决口扇地区以旱作为主的农作物结构及缺少有效灌溉系统的特征是一致的。

统计还发现,沿涡两岸的决口扇亦存在较为明显的边界。例如在亳县西南隅距离涡河主流较远的梅城乡,境内并无条带状的沙淤土壤分布规律,沙土仅是零星散布,中间错杂着其他土壤^[13]。在远离涡河主干的诸多其他乡镇,沙土、淤土的分布也多呈

随机性,这些区域可判断为涡河决口扇的边缘地带。

综上所述认为,历史上黄河夺涡走涡过程中的决口泛滥,在涡河沿岸地区也塑造形成了显著的决口扇地貌,其与黄河主故道南岸的核心决口扇边缘相叠加,形成一种叠加型决口扇地区。这样的区域也代表着明清黄泛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由此我们也更容易理解,1938年花园口决堤后的黄泛水流为何多沿颍而行,沿涡地区行洪及淤沙的影响反而比不上颍河沿岸地区。这是因为沿涡地区在明清时期就已堆积形成次级的黄泛决口扇,其已淤高的地表阻碍着1938年黄泛水沙越过涡河向东北继续蔓延,从这一角度来看,涡河又充当了黄河主流北徙之后偶发性南泛的泛区分界线。从最上层土壤的形成机制来看,颍河北岸部分地区的表层土壤偏向为1938年黄泛留下的泥沙层,涡河两岸则主要是明清黄泛留下的泥沙层。

三、大型湖泊洼地:黄泛决口扇的调剂区

1. 大型湖泊洼地的边界作用

历史上黄河下游平原地区广布湖泊洼地,湖泊水文在长期黄泛影响下发生着剧烈变化,因此湖泊变迁史也成为反映黄泛区环境演变机制的重要视角。对此邹逸麟先生曾作精辟总结:“黄河下游平原湖沼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决定黄河下游河道的泛、溢、决、改所带来水沙的再分配。”^[14]承邹先生观点,笔者通过对黄泛冲积平原拓展与湖泊演变关系的研究认为:长期黄泛水沙的流泛与倾注,通过不均质地沉积和抬高湖底,不仅造成湖泊水面的涨缩或位移,使得洼地积水区频繁变动;而且当迎黄面的湖底泥沙堆积足够高厚时,积水面则演变为陆地,使得黄泛决口扇的边缘向前推进。总体来看,大型湖泊洼地的积水面与黄泛决口扇的前缘互为进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大湖大洼相当于黄泛决口扇肆意扩展的临时屏障或者边界。

史料所记被黄泛泥沙淤填而发生变化的中小型湖泊不胜枚举,我们先借之以观察黄泛泥沙对湖泊水文的影响方式。以清代中期睢宁县湖泊群的变化情况为例。白马庄湖,在睢宁县治西北八十里,为周围山间众水所归,原为大湖,但自康熙七年(1668年)花山坝决口后,黄河水从西面灌注而北,湖面“沙淤其半”,康熙二十一年民众将湖面淤成的土地二十六顷升科纳税。睢宁县其他几个主要湖泊,如

白山湖、白马湖、黄山湖,也都是在清代中期其迎黄面部位发生严重淤积,变成大面积生科纳粮的耕地。另据史料载,黄山湖的湖面在清中期也发生了显著位移,因其西半面被沙淤抬高,湖水“渐逼而东矣”^[15]。湖泊水面与成陆及农田化的交替性变化,明显体现了洼地积水区对黄泛水沙的再分配作用。

大型湖泊在黄泛水沙影响下的水文变化原理与中小湖泊大致相同。比如处在明清黄河故道以南、运河以西的洪泽湖群,其长期被黄水灌注亦是产生两种后果,或者湖面扩大、移动,或者浅处成陆^[16]。明中期黄河全流夺淮后,加之高家堰的修筑,洪泽湖群水面明显扩大,富陵湖、白水塘等原先独立的湖泊,在淮涨时连为一片,“大淮穿其中,采鱼船只百余,岁委官量船纳料以备”^[17]¹³;清初,由于黄河主河床淤高,清口排水不畅,黄水频繁地从清口倒灌入湖,洼地积水区明显向西南两面扩大,成子洼、安河洼等大型洼地沦为积水区^⑩;但至清中期,洪泽湖西北部迎黄面发生严重淤积,湖区形成北高南低的格局,乃至挤压入湖的淮河水流向东南分流入江,其主要原因是从西北面灵、睢、宿、邳而来的黄泛泥沙大量入湖并沉淤在湖口一带^⑪。又如处在苏北里下河洼地的射阳湖,在明代中期黄河下游单一型河道形成后,泛水频繁到达南面的湖水,湖底出现明显的淤浅和积水面扩大。明天启《淮安府志》对这一变化有记:“嘉隆间黄淮交涨,溃高宝堤防,并注于湖,日见浅淤,因盈溢浸诸州县。”^[17]⁷由于黄水长期从西、北两面向湖区灌注,射阳湖北半部湖滩淤高,大量湖面被开垦为农田,现在射阳湖区的地势仍是自西向东、自北向南逐渐降低,北面拥有更多的农垦资源^[18],这与湖区西北部长期正面接受黄泛水沙的冲击和灌注是分不开的。

尽管在黄水灌注下大型湖泊洼地的水陆边界不断发生变化,但总体上都发生在一个连绵广阔的洼地单元内,黄泛泥沙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这种巨大的低洼地貌,因此本文认为,从大型洼地整体的角度来讨论某一时期内黄泛冲积扇的边界与水沙运动规律,同时对大型洼地水面对于洪涝水灾的调蓄作用进行讨论,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

2. 决口扇边缘的湖泊调剂区

大型湖泊长期作为决口扇边界与黄泛水沙的调剂区,其沿湖地区的水土生态必然有所反映,因此还需进一步观察沿湖地区土壤分布的规律性。以下试以明清黄河下游主故道北岸的南四湖边界及临湖的山东省鱼台县的土壤情况为例作些分析。

南四湖,是南阳、独山、昭阳、微山四湖的总称,其地质基础为第四纪以来处于不断沉降之中的连片洼地及湖盆,后来随着黄河河道摆动及决口扇的不断推进,湖缘的水陆边界进一步凸显,宋元时期在黄河洪水及周边山水的灌注下,扩展为绵延连片的湖泊巨浸^[19]。明清时期黄河水沙灌入南四湖区的事件很多,对湖泊积水面分布和湖底高程的变化不断发生着影响,例如明嘉靖二年“黄河决曹单,更决丰沛,灌昭阳湖,北冲鱼台谷亭,周环数百里间,森然大壑”^[20];嘉靖四十四年“河决新集,塞庞家屯,东趋华山,出汇飞云桥,分七股而奔冲入昭阳湖,由是沛之北水逆行,历湖陵、孟阳至谷亭四十里”^[21]。黄泛水沙不仅进入湖泊洼地,对其周边陆域及运河的影响也显然可见。在现代地形图上,南四湖群的西南面与黄河故道北岸的单丰决口扇相接,直观地反映了四湖曾在黄泛冲积扇推进中所起的界限作用。

山东鱼台县地处南阳湖和昭阳湖的西岸,平原地貌,历史上频受黄河决泛水灾的影响。清康熙《鱼台县志》“灾异”条记载明清鱼台县遭受黄泛水灾的事件列举如下:“明太祖洪武四年,河决巨野,流灌县境,害及田畴”“孝宗弘治五年春三月,河决黄陵冈,淹没及境”“武宗正德二年三年,黄河连决单县,溢流入境,害民田庐”,明世宗嘉靖八年“河决,水及境,城几没,议迁,中止”,清顺治二年(1645年)“河决通流、金降等口,至九年莫能治,凡八年间,县境淹没,人民失业、逃亡者,十室而九,田产荒芜,蒲苇弥望,萧条极目”“康熙元年八月十七日,河决牛市屯口,水漫入境”^[22]。由史料来看,黄河决口地点都在鱼台周边县份(因黄河行水主道所经,亦据河道主槽摆动的影响),洪水以漫流的形式到达鱼台境内,水流速度与泥沙沉积的方式必不能与洪泛上游地区(决口点附近)相比,故鱼台并不是黄泛决口扇的核心地带,而是处于单丰决口扇(明中期之后形成)或郟巨决口扇(明初之前形成)的边缘位置。但鱼台东面濒临大湖,巨大的水面对灌入的泥沙具有沉淀、缓冲和容纳作用,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鱼台平原的土壤分布有着怎样的特点?

1996年成书的《鱼台县地名志》,全面收录各乡镇自然地理、人口史、农业环境等方面的资料,据之可对鱼台县土壤类型的分布、其形成机制等进行分析。先以正处单丰决口扇与大湖之间的“老砦乡”为例来做一细致观察,原资料中老砦乡的叙述如下:

老砦乡位于鱼台县境的东南部,东临江苏省的沛县,南依苏鲁边河与江苏省的丰县毗邻。

西隔复兴河与谷亭镇相望。北靠微山县的南阳湖。

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南部为黄沙土,北为红淤土。^{[23]69}

以农业为主,主要作物有小麦、水稻、大豆、玉米、棉花、苹果等。

清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此地黄水退后,曾为一片荒野,当时有一古老高台,从巨野邢海迁来几户人家,在此居住。后又继续迁人,为了安全筑一土砦,故取名老砦。^{[23]71}

分析可知,老砦乡东、南两面紧邻江苏省沛县和丰县,明清时期丰、沛两县沿黄段正是黄河频繁决口的地段,老砦地区受灾的洪水应是从南面丰沛方向而来。直到清咸丰年间,老砦仍遭受黄泛洪水的淹没。在长期黄泛水沙的浸淹下,该乡南部形成黄沙土,其北部滨湖区地势低洼,在黄泛泥沙的充填下形成淤土。该乡地势南高北低,体现了决口扇从中心向边缘地势降低的特点。从土质分布上看,老砦乡具备黄泛决口扇沙、淤两种土壤呈条带状分布的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老砦乡北部临湖地区有大面积的淤土区,资料中强调该区以前属于“荒湖涝洼,十年九灾”^{[23]69},这使我们看到大型湖泊洼地接受黄泛泥沙改造而变为冲积平原的长期性,亦即湖泊洼地对黄泛水沙的调剂作用。这一地区洼地连绵广大,即便有大量泥沙源源不断地填充,其抬高为陆、再变为农田民居的进程,也需要较长时间。在这一水陆交互过程完成之前,湖群岸线就充当了黄泛冲积平原的显性边界。

为进一步观察南四湖对黄泛决口扇的界限作用,本文也对鱼台全县沙土、淤黏土分布典型的乡镇作了地理位置及农业生态的统计^⑩。分析发现,沿湖各乡的土质均是以淤黏土为主,显著具有黄泛泥沙填充洼地并受水浸后的表层土特征,其农作物结构则均为水旱兼作,以小麦和水稻为两大基本种类。晚近填淤形成的临湖陆地,仍保持着低洼形态,易淹易涝,但具有水稻种植所需的水网型水利条件。而不临湖的乡镇土质全部以沙土为主,农业种植基本为旱作,均不包含水稻,显示出其接近决口扇核心区的地理位置特征和水利特点。

鱼台县的土壤分布及农作物结构,较好证明了南四湖洼地长期作为黄泛决口扇边界的作用机制,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南四湖洼地也是明清时期黄泛水沙北泛蔓延的重要蓄洪区和调剂区,在特定的

历史时期内,它屏障着黄泛洪水的肆意漫流以及黄泛决口扇的扩张。

结 语

本文采用黄泛水沙影响区的土壤遗存、村镇聚落的黄泛记忆、民众生计方式等多源资料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通过复原这些要素在明清黄河下游决口扇边缘带的分布规律,对明清时期黄河下游泛滥水沙影响的地域空间范围和内在差异进行综合研判,希冀能够为黄泛区生态环境史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精细化,以及今天黄泛区的农业发展规划及灌溉水利建设等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地理方面的参考。研究过程中以明清黄泛决口扇的位置分布及土层规律为切入点,充分注意到决口扇边缘带与重要地理景观的位置关系,将黄泛区的显性边界落实到了具体地点及大河大湖等地理景观的位置上。首先,对明清时期黄泛夺溜的主要河道——颍河及涡河沿岸地区的决口扇样态、土壤类型分布、聚落史记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对明清黄泛区西南部边界的环境特征进行判断和总结;其次,基于大型湖泊洼地对黄泛水沙具有显著的调剂和蓄纳功能这一原理,对南四湖沿岸地区的水土生态和决口扇边缘带的地貌特征进行了案例式研究,并进一步对大型湖泊洼地长期作为黄泛决口扇边界的规律性进行总结。

本文研究结论具体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明清黄泛水沙对颍河沿岸平原地区的环境和地表塑造的影响相对较轻,受灾后果主要表现为颍水河道的河床淤高及河漫滩的拓宽和抬升,或轻微向河道两侧的泥沙漫溢,颍河两岸地区并未形成显性决口扇地貌。颍河南岸尤其少见晚近决口扇地貌的痕迹,大致可证明清历次黄泛水沙一般不越过颍河向西南漫溢。总体上颍河沿岸地区长期发挥着黄泛滞洪区作用,颍河干流较大的容水容沙能力加上沿岸略高的地势,使其长期作为黄泛水沙的良好容受体和蔓延扩张的界隔线。总体可认为颍河河道是明清黄泛决口扇的西南边界。大河干流充当明清黄泛区边界的现象,在稍往东南的淮河中游干流段也有明显体现。

第二,明清时期涡河沿岸地区不仅受到黄河独流干道决口水沙向南泛滥的影响,涡河本身被黄水夺溜时的决口泛滥,亦对其两岸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较大影响。黄河夺涡走涡造成的灾情更为严重,在涡河沿岸地区塑造形成了显著的决口扇地带,这

从沿涡两岸表层土壤表现出黄泛沉积物带状分布的强规律性可得证明。黄河主故道南岸核心决口扇的边缘带与沿涡决口扇相叠加,形成一种叠加型决口扇地貌。总体上涡河河道可以说是黄泛重灾区与影响轻微地区的分界线。

第三,在黄泛水沙的灌注充填之下,大型湖泊洼地的积水面通常与黄泛决口扇的前缘互为进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大湖大洼实际充当黄泛决口扇肆意扩展的屏障或者边界。鱼台县的土壤分布及农作物结构特征,较好证明了南四湖洼地长期作为黄泛决口扇边界的作用机制,同时南四湖也是明清时期黄泛水沙向北蔓延扩张的重要蓄洪区和调剂区。

希望本文所揭明清时期黄泛区决口扇地貌的分布规律及相关的地表现象,为黄泛区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些许参考。后续我们将进一步关注黄泛区人地关系长期演变的丰富层次性和规律性,更好地服务于现实中黄泛区的生态环境恢复建设和水土资源开发利用的建设。

注释

①通过决口地点及决口时间、频次的统计来探讨黄河下游河道的水文规律及河势演变规律,一直为学界所重视。较早的专门研究主要有庄积坤:《一八五五年前后黄河沁河口至铜瓦厢河段情况初探》,《人民黄河》1982年第1期;王守春:《黄河下游1566年后和1875年后决溢时空变化研究》,《人民黄河》1994年第8期。近期著作有孙涛:《明清黄河故道流路变迁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②韩昭庆:《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黄河长期夺淮期间淮北平原湖泊、水系的变迁和背景》,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刘会远:《黄河明清故道考察研究》,河海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段伟:《历史政治地理对水患的响应:以明清时期的黄淮平原为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胡其伟:《明清时期黄运交汇下苏鲁豫皖接壤地带的耕作制度变迁》,《历史地理研究》2023年第4期等。此类研究均是在明清黄河下游水患频发的背景下,对黄泛平原水环境、农业环境、城市聚落环境等的响应情况进行复原和分析。③可参见郭涛《明代黄河下游的河患及前期的分流》一文对黄河决溢地点统计方法在黄泛区环境史研究中局限性的评述,以河道决溢的次数说明河患的大小,以决溢的地点表示其危害的区域,这是常用的一种表示方法。黄河决溢的结果是受灾,决溢多受灾频繁。决溢有大小之分,而且常常此处决溢,彼处也受灾,因此单凭决溢次数与地点来说明受灾的程度和区域是不全面的。参见中国水利协会水利史研究会:《黄河水利史论丛》,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54—55页。④沈怡对历代黄河决溢地点及次数进行统计,居于明清主故道线上决口次数偏多的典型地区如下(包括明代以前黄河下游河道短暂南摆时的决口):杞县108次,开封83次,安东62次,铜山55次,曹县38次,兰封37次,淮阴37次,淮安36次,泗阳31次。转引自韩昭庆《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黄河长期夺淮期间淮北平原湖泊、水系的变迁和背景》,第37—38页。王守春对明中后期黄河独流入淮时期(1566—1855年)其下游河道主要决口地点及次数进行统计,发生过两次以上决口的险工地点有36个,其中砀山毛城铺发生

决口5次,封丘荆隆口、徐州花山坝、桃源崔镇、安东邢家口等发生决口4次。参见王守春《黄河下游1566年后和1875年后决溢时空变化研究》,《人民黄河》1994年第8期,第56页。又据庄积坤统计,从1572年至1855年不足300年间,黄河全下游有决溢记载的共165年,且一年中有多处决口的情况较为常见。参见庄积坤《一八五五年前后黄河沁河口至铜瓦厢河段情况初探》,《人民黄河》1982年第1期,第56页。虽然各家统计所依据的史料来源及尺度不一,决口次数统计结果存在偏差,但可以说明黄河下游河道决口地点密布、决口次数频繁的特点。⑤1959年水利电力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人民黄河》第二篇“黄河灾害及历代治理情况”,较早地对黄河下游改道的地势规律进行总结,文章指出,黄河南流主要有泗水、汴水、睢水、涡水、颍水等五条泛道,但以汴水泛道流经的时间最长,为各条泛道的主干。其原因是汴水迎合了黄河入海水流就下总是寻找地面坡度最陡和距海最近的水道要求。参见水利电力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人民黄河》,水利电力出版社1959年版,第61页。⑥徐海亮从地质学角度指出黄河下游长期走汴的原理,远古黄河南泛进入淮北平原的首要位置,在郑州东的开封拗陷区,古郑州东北(含今原阳、封丘)、郑州—兰考断裂和新乡—商丘断裂,与穿越黄河的武陟、老鸦陈、花园口、原阳东断裂,构成一个拗陷区单元,其孕育了晚更新世的前泛河(汴河古称)颍河泛道带,从更新世到全新世,这里始终是持续沉降区,为黄河南下的第一选择。参见徐海亮、轩辕彦:《史前时期黄河泛及济淮的地文探索》,《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2022年第2期,第7页。⑦例如乾隆《柘城县志》“河渠”条下记有“金大定二年七月,黄河决卫州,柘亦被害”,“元至元元年三月,黄河水溢,柘境被淹”,“元延祐元年夏六月,河决,睢柘被灾”等,从中无从得知黄河决口的具体地点与涡河行水河道有何关系。参见乾隆《柘城县志》卷二《建置志》,乾隆三十八年刻本,第7页。⑧详见《河南省柘城县地名志》第二编《政区、聚落地名编》相关内容,具有典型水灾记忆的村落例如:居于涡河南岸的赵庄村、义醒岗村、于庄村、后张店村;居于涡河北岸的孟庄村、阎楼村、侯楼村、王庄村、董口村、高庄户村、沙土李村、玉皇庙村等。参见柘城县地名志编辑室编:《河南省柘城县地名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55、67、71、263、275、276、286、291、300页。⑨关于黄泛区的土壤类型特征,此处谨列举相关著作在论述黄泛区地理环境时的运用实例,以示土壤类型可作为判断黄泛区范围的重要生态依据。例如,《江苏农业地理》对徐淮农业区的定义为位于黄淮海平原的南缘,以黄泛平原为主体,耕作土壤主体为黄泛平原的黄潮土(包括淤土、两合土、沙土、飞沙土、花碱土)等。参见《江苏农业地理》编写组编:《江苏农业地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69页。《开封市土地志·杞县卷》记杞县北部多系沙平地,由黄河冲积和风积而成,组成物质以粉沙为主。杞县南部多泛淤平地,是原始低洼地在黄河泛滥时,泛道外侧黏土和亚黏土堆积而成。参见杞县土地房屋管理局编:《开封市土地志·杞县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商丘地区土地志·民权卷》记全县冲积物面积占总面积的95%以上,因沉积物质受水流的分选明显,距(黄河)河床越近,质地越砂,越远质地越黏。由于黄河决口大小、时间长短、流速快慢不同,同一地段各次沉积厚度、机械组成各不相同,故垂直结构上,层次分明,厚薄不一,砂黏交错。参见民权县土地房屋管理局编:《商丘地区土地志·民权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⑩参考1989年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等编:《中国黄淮海平原地貌图(1:1000000)》,内部发行1989年版。尤其应注意图中“1855年前黄河故道(Yellow River Pre 1855)”两岸的决口扇分布特征。⑪统计资料来源:亳县地名办公室

编:《安徽省亳县地名录》,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18—315页。统计涉及的主要是沿涡河主干道两岸的乡镇区片,包括汤凌、魏岗、后孙湾、刘小庙、马场寨、颜家楼、石桥铺、辛集、大寺、李大、沙土、张竹园、十八里、安溜、十九里、李门楼、大杨、丁固、王大庄、薛菜园、城父等乡镇。⑫参见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铅印本(两轩存稿本),1928年版,第2页。⑬光绪《睢宁县志》所记关于黄泛水沙灌入洪泽湖的方向:“乾隆十八年九月,铜山张家马路河决,全溜南注灵虹诸邑,归洪泽湖,由五坝洩入高宝诸湖,十二月合龙,河归故道。是年秋,大水,铜沛厅属张家马路漫口,水由灵睢宿下注,出小河口归洪湖。”参见光绪《睢宁县志》卷五《河防志》,光绪十二年刻本,第15页。⑭统计所依据资料:《鱼台县地名志》第四章《现行区划和居民地名称》,第57—339页。所涵盖乡镇包括周堂乡、罗屯乡、李阁乡、陈楼乡、鱼城镇、谷亭镇、王鲁乡、武台乡、张黄乡。其中罗屯、李阁、陈楼、鱼城不临湖四乡的土壤类型,原文未明确指出,笔者根据其农作物类型不含水稻的特征及接临单丰决口扇而远离湖泊的位置,将其判断为“旱作土壤”。黄泛区旱作土壤一般偏沙土性质。参见韩树杰:《鱼台县地名志》,山东省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

参考文献

[1] 刘会远. 黄河明清故道考察研究[M].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 1998:43.
 [2] 胡其伟. 明清时期黄运交汇下苏鲁豫皖接壤地带的耕作制度变迁[J]. 历史地理研究, 2023(4): 87-95.
 [3] 《江苏农业地理》编写组. 江苏农业地理[M].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79:3.
 [4] 温敏. 顺治本《陈州志》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96.
 [5] 韩昭庆. 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 黄河长期夺淮期间淮北平原湖泊、水系的变迁和背景[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6] 水利电力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人民黄河[M]. 北京: 水利电力出版社, 1959:61.
 [7]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等. 中国黄淮海平原地貌图(1:1000000)[M]. 内部资料, 1989.
 [8] 周口市川汇区地名志办公室.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地名志[M]. 内部资料, 2004.
 [9] 王清彦, 张喆, 莫尔淮. 陈州志[M]. 刻本, 1695(清康熙三十四年).
 [10] 王敛福. 颍州府志[M]. 刻本, 1752(清乾隆十七年): 65.
 [11] 寿濂. 柘城县志[M]. 刻本, 1554(明嘉靖三十三年): 1-2.
 [12] 柘城县地名志编辑室. 河南省柘城县地名志[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13] 亳县地名办公室. 安徽省亳县地名录[M]. 内部资料, 1984:200.
 [14] 邹逸麟, 张修桂. 中国历史自然地理[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257.
 [15] 刘如晏, 李杰. 睢宁县志[M]. 刻本, 1718(清康熙五十七年): 12.
 [16] 佚名. 成湖考[M]//《洪泽湖志》编纂委员会. 洪泽湖志.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3:673-681.
 [17] 宋祖舜, 方尚祖. 淮安府志[M]. 刻本, 1626(明天启六年).
 [18] 王冬梅, 黄俊友, 赵钢, 等. 平原水网地区湖泊群退圩还湖规划研究: 以里下河射阳湖为例[J]. 水利水电技术, 2014(2): 28.
 [19] 张义丰. 淮河流域两大湖群的兴衰与黄河夺淮的关系[M]//张义丰, 李良义, 钮仲勋. 淮河地理研究. 北京: 测绘出版社, 1993: 174.
 [20] 武同举. 江苏水利全书[M]. 南京水利实验处印行本, 1949:2.
 [21] 李棠, 田实发. 沛县志[M]. 刻本, 1740(清乾隆五年): 13-14.
 [22] 马得祯. 鱼台县志[M]. 刻本, 1691(清康熙三十年): 8-12.
 [23] 韩树杰. 鱼台县地名志[M]. 济南: 山东省地图出版社, 1996.

The Spatio-temporal Changes and the Human Land Relationship Pattern of the Flooded Areas of the Lower Yellow River Regio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u Junfan

Abstrac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surface shaping by the overflowed water and sediment of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on the plain areas along the Ying River were relatively light. There was no obvious crevasse fan landform formed on both sides of the Ying River, and the yellow floodwater and sand generally did not overflow southwest across the Ying River. The main stream of the Ying River had long been a good receptor for yellow floodwater and sand and also a boundary line for its southwest expansion. The areas along the Wo River were affected by the dual effects of the southward flooding of water and sand from the breach of the Yellow River’s main channel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well as the flooding of water and sand caused by the Wo River itself while its bed was occupied by the Yellow River floods. The edge zone of the core breach fan on the south bank of the Yellow River’s main channel intersected with the secondary breach fan along the Wo River, forming a superimposed breach fan landform along the Wo River area. The main stream of the Wo River had long served as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severely affected areas and the lightly affected areas of the Yellow River flood. The water accumulation surface of large lakes and depressions usually moved back and forth with the front edge of the Yellow River floodplain fan. The soil distribution and crop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Yutai County provided good evidence that the Nansihu Lake depression had long served as the boundary of the Yellow River flood breach fan. Nansihu Lake was an important flood storage and adjustment area for the northward spread and expansion of Yellow River overflowed water and sedimen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flooded areas of the Lower Yellow River Region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xplicit boundary; crevasse fan landform; soil; flood memories

责任编辑:王轲 长亭